



清代學者
文集叢刊

潛研堂集

〔清〕錢大昕撰

呂友仁

校點

惟

大德享大年擬天皇之萬八千歲迺以元日之吉

大宴在廷三巡之湛露方灑六出之瑞霙旋降敷滂洋

之

闡澤宜寬大之

詔書藏富於民譽髦斯士益下勿問元吉大賚而除穢

結之征鼎養是以大亨闢門而進詩書之彥擊壤而歌

幸點鑒井耕田拔茅而集天衢承筐鼓瑟周官之興三

總包乎在宥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人有慶展也大成萬國咸寧巍乎盛烈洵生民以來

未有而自天之祐以巾也迺者歲在上章月惟南呂紀

金穰之上瑞物始由庚慶稽事之成功秋當平秩計

膺圖之歲逾三十而五居其中潮誕

聖之初周六旬而數將復始近中秋之三五謙而不盈

驗瑞莢之十三滋而益長虹流昂貫長生應首出之符

璧合珠聯上元啟昇平之運冒茹於卯海宇之丕冒無

清代學者
文集叢刊

〔清〕錢大昕撰

呂友仁 校點

潛
研
堂
集

一
籍
出
版
社

一
籍
出
版
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潛研堂集/(清)錢大昕撰;呂友仁校點.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6

(清代學者文集叢刊)

ISBN 978-7-5325-5333-4

I. 潛... II. ①錢... ②呂... III. 古典文學-作品集-中國-清代 IV. I214.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049688 號

清代學者文集叢刊

潛 研 堂 集

(全二冊)

[清]錢大昕 撰

呂友仁 校點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出版、發行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43.375 插頁 11 字數 850,000

2009年1月第2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800

ISBN 978-7-5325-5333-4

K·1205 定價: 98.00 元

前言

錢大昕，字曉徵，一字及之，號辛楣，又號竹汀居士。江蘇嘉定（今屬上海市）人。生于清雍正六年（一七二八），卒于嘉慶九年（一八〇四），享年七十有七。

錢大昕是清代的漢學大師，乾嘉學派的鉅子，吳派學者的卓越代表，在當時就負有盛譽。梁玉繩把他比作鄭康成，王昶把他比作王深寧，錢載把他比作顧亭林。時人的這些比喻，說明了錢大昕學問的博大精微和造詣之高，這正如江藩在漢學師承記中所說：「先生學究天人，博綜羣籍，自開國以來，蔚然一代儒宗也。」

一

錢大昕的一生，大致可以分爲三個時期：舉業期，仕宦期，歸田期。儘管每一時期各有其特點，但不難發現，孜孜問學，矻矻著述，乃是貫穿他一生的共同點。

舉業期。從他童年入塾開始，到乾隆十九年中進士止。錢大昕出身貧寒，他多次談到，「吾家累世寒士」〔一〕，「予家貧無負郭田」〔二〕。他的祖父都是縣學生，依靠課徒維持家計。他自己

在得到秀才的功名以後，也曾一度操塾師生涯，當時才十八歲。鄉試並不順利，但後來接連發生的兩件事，使他終生懷念不已。第一件事是乾隆十四年他以高才生被召入蘇州紫陽書院就讀。這件事對他未來的造詣影響極大。院長王峻很賞識他，稱嘆說：「此天下才也！」並「誨以讀書當自經史始」。王峻以疾辭去，繼主書院的是沈德潛。沈是「江南老名士」，詩名尤高。錢大昕又親炙函丈，承其指授。吳中宿儒，如惠棟、沈彤等人，也引爲忘年交。惠氏之學，「求之十三經注疏，又求之初唐以前子史小學」，這對錢大昕影響很大。書院的同學當中，有王鳴盛、王昶、褚鶴侶等人，彼此氣味相投，以古學相策勵。如此名師，如此益友，加之蘇州自來是人文薈粹之地，錢大昕就在這樣的環境中，耳染目濡，潛心涵泳，這就爲他以後的治學奠定了一個雄厚的基礎。第二件事是，乾隆十六年，乾隆皇帝首次南巡，江浙士子紛紛獻賦進詩，錢大昕是其中之一。由于詩賦入選，被特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因爲這是制科以來的曠世盛典，聞者莫不嘆羨。錢大昕有詩紀其事云：「葵藿忽回初日照，鸞鳩何分上林棲。却笑杜陵誇獻賦，五年才得尉河西。」初試得售，好不得意。次年，他就買舟北上了。

仕宦期。從乾隆十九年中進士起，到乾隆四十年丁父憂止。這一時期，錢大昕在仕途上是一帆風順的。中進士後即被選爲翰林院庶吉士，散館後即授翰林院編修。乾隆二十三年，擢右春坊右贊善。二十五年，擢翰林院侍讀。二十八年，擢翰林院侍講學士。三十八年，擢詹事府少

詹事。三十九年，提督廣東學政。這期間，曾先後充任山東、湖南、河南鄉試正考官及浙江鄉試副考官，並曾奉旨入直上書房，教皇十二子讀書。這一時期也是錢大昕在學術上的積累期和成熟期。錢大昕是個主張作史不廢著述的人，他回憶京都生涯說：「在京都退食之暇，唯以經史自娛，討論異同，貫串古今，丹黃不去手，既專心于著述（一）」。這時的讀書，偏重史部，自謂「予弱冠時，好讀乙部書。通籍以後，尤專斯業（二）」。同時旁及小學、金石、算術，其刻苦程度，自云「寢食幾廢（三）」。他之所以用力如此之勤，是因為他認為「古人以立言為不朽之一（四）」，「人皆可忠義，不皆可儒林。慷慨一時事，著述千秋心（五）」。

這期間，除了奉敕參與撰修的書以外，他個人的著述也不少，廿二史考異的撰寫就開始于此時。還有一事應當提及，這就是在錢大昕的進士同年中有紀昀、王鳴盛、朱筠等人。這些人志同道合，常有接觸。他們都是乾嘉學派的主將，他們之間的交往，無異于順風呼唱，推波助瀾，這對於當時學風的影響，不可低估。

歸田期。從乾隆四十年奔父喪起，到嘉慶九年卒于紫陽書院止。錢大昕本來就性情淡薄，時有歸田之志。他不止一次地講，「平生富貴吾不戀（一）」，「故知名位之有盡，不若文章之無窮（二）」。

乾隆四十年，因為丁父憂，加以母老，於是決計家居不出。歸田三十年間的活動，可以用「教士有成，著述更富」八個字來概括。王昶作錢大昕墓誌銘說：「歸田三十年，歷主鍾山、婁東、紫陽三書院，而在紫陽至十六年之久。門下士積二千餘人，其為臺閣、侍從，發名成業者，

不可勝計。蓋皆欽其學行，樂趨函丈，即當事亦均以師道尊禮之〔吾〕。按錢大昕主鍾山書院（在今南京）、婁東書院（在今上海松江）各四年，通計在紫陽書院之十六年，共二十四年。可以說，歸田期間，除了因居喪和自己生病的數年以外，未嘗一日離書院。經錢大昕指授成名的士子，錢大昕自編年譜及錢慶曾竹汀居士年譜續編會略舉其尤者，但尚有未備。譬如清代治說文的四大家之一的朱駿聲，就是出自他的門下。允禧（朱駿聲號）府君行述記其事說：「十五歲，冠郡試，補府學生。時嘉定鍾宮詹大昕主紫陽書院講席，一見奇府君才，曰：『吾衣鉢之傳，將在子矣！』遂受業門下〔吾〕。」錢大昕晚年多病，爲了莘莘學子的培養，他勉力支持。他的死，不是死于里居的床第，而是死于紫陽書院院長的崗位上。總而言之，我們如果說錢大昕也是一個克盡職守、卓有成就的教育家，想來也不爲過。這一時期也是他著述的豐收期。他的主要著作，如廿二史考異、十駕齋養新錄和潛研堂文集等，都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他在晚年所作的詩中說，「唯餘文字癖，欲療無醫案〔吾〕」，「人皆憎老物，吾尙戀殘編〔吾〕」，可見他著述的勤奮。

七十歲時，他在潛研老人自題像贊中說：「官登四品，不爲不達。歲開七秩，不爲不年。插架圖籍，不爲不富。研思經史，不爲不動。」這是他對自己將近一生的總結。

錢大昕在學術上的貢獻是多方面的。阮元曾說：「國初以來，諸儒或言道德，或言經術，或言史學，或言天學，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韻，或言金石詩文，專精者固多，兼擅者尙少，唯嘉定 錢辛楣先生能兼其成。」這話一點不錯，但就其嚮惠後人最多的方面來講，是他在史學和音韻學方面的貢獻。

錢大昕在史學方面的突出貢獻，集中表現在他的廿二史考異一書。我們知道，研究歷史，必須建築在可靠的史料基礎上，而考異一書，最能滿足我們在這方面的要求。考異一百卷，凝結了他大半生的心血。書成之後，受到學者的一致稱贊。焦循寫有廿二史考異贊，他說：「曆事之學，博大精微。於何爲極？遷、固、修、祁。地詳沿革，算澈中西。職官制度，考核靡遺。以斯治史，乃得會歸。孰云乙部，易于經師？」李慈銘說，趙翼的廿二史劄記，「以視錢氏 廿二史考異，固相去天壤，即擬王氏之十七史商榷，亦遠不逮也」。應該說，考異是反映清代史學成就的代表作之一。

對於考異，我們不能把它簡單地指爲校勘異同、考訂是非的書。其實，它包含的內容非常豐富，遠非上述八個字所能範圍。錢大昕沒有史學理論、方法專著，他的史學理論和方法，散見於他對具體史事考訂的文字中。通過考異一書，他所留給我們的，不僅僅是無數的具體考訂成果，雖然僅此一項也足以使他立于史學大家之林，而更重要的是，他還有理論，有方法。「篤

鴛鴦了從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錢大昕不僅讓人們看到了繡好的鴛鴦，就是那只繡鴛鴦的金針，他也是拿來度與後人的。

考異中的史論很多，例如，針對宋濂、王禕所修元史的立傳不當，他說：「宋、王兩公不獨無史才，並無史識。」針對史家不博聞的通病，他說：「予嘗論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輿地，次辨氏族，否則涉筆便誤。」針對官修國史的差互百出，他說：「蓋自唐以後，修史不出一人之手，志傳之文，不相檢照，至于如此。」對具體史實的議論也不少，例如，針對宋書、南史的恩倖傳，他說：「六朝人重門第，故寒族而登要路者，率以恩倖目之，殊未得好惡之平。」針對宋史把靖康之禍諉罪于趙良嗣等三人，他說：「天之厭宋久矣！宋之亡，宋自亡耳，豈三人之咎哉！」這些，雖然不出封建社會史學家的窠臼，但也可以看出，作者並非是局限于校勘考訂一隅的。

考異中還有許多隨文而出的注解，這給學者帶來了很大的便利。例如，新唐書地理志行文過省，錢大昕唯恐學者誤解（實際上這種誤解今天還有），特地加上按語：「志凡稱某州某郡者，謂本是某州，中間曾改爲某郡耳，非州郡之名同時並立也。」宋史燕王德昭傳云：「建炎二年，分西外宗子於泰州。」錢大昕注云：「朱子語類：徽宗以宗室衆多，京師不能容，故令秦王位下子孫出居西京，謂之西外。」

錢大昕的考訂方法，有兩點值得特別提出。一是利用金石文字與古文獻相印證，也就是王國維所說的「二重證據法」。例如，他說：「六朝人多稱刺史爲史君。予家藏東魏光和二年敬顯儒碑，額題敬史君，字畫分明。高澄爲滄、定二州刺史，亦在東魏時，傳稱史君，與石刻正合，監本改『史』爲『使』，所謂少所見多所怪也。」二是利用音韻學進行考證。例如，他說：「禿髮之先，與元魏同出，禿髮卽拓跋之轉，無二義也。古讀輕唇音如重唇，故赫連佛佛卽勃勃。髮從友得聲，與跋音正相近。」這兩種方法他使用得非常純熟，所以能够發隱微，訂千年未正之訛誤。

錢大昕在音韻學方面的突出貢獻，表現在他對古聲紐的研究。錢大昕以前的古音學家，只研究韻而沒有研究聲紐，古聲紐的研究是從錢大昕開始的。他認爲：後世讀輕唇音的非數奉微四母，在漢魏以前都讀重唇幫滂並明，輕唇音產生于六朝之後；舌上音知徹澄三母，古讀端透定。這種說法已成定論。他還認爲：「古人多舌音，後代多變爲齒音，不獨知徹澄三母爲然也。」這也給後人以很大啓發。他不僅給後人留下了科學的結論，而且也留下了縝密的研究方法。他在古聲紐研究中使用的方法有四點：根據異文或聲訓研究，從諧聲偏旁研究，從類隔切分析，從譯音字研究。這些方法，也都被後人所採用。

三

錢大昕的治學態度，一言以蔽之，曰「實事求是」。他自己就說：「通儒之學，必自實事求是始。」具體來說，表現在下述幾個方面。

第一，不分門戶，唯是之從。他說：「後儒之說勝于古，不必強從古可也。一儒之說而先後異，從其是焉者可也。」他批評某些學者，「性情偏僻，喜與前哲相齟齬，說經必詆鄭、服，論學先薄程、朱，雖一孔之明非無可取，而其強詞以求勝者，特出于門戶之私，未可謂之善讀書也。」無論是對漢儒或宋儒，他都抱着唯是之從的態度，不存畛畦之見。鄭玄是漢儒，他說「鄭君兼通六藝，集諸家之大成，刪裁繁蕪，刊改漏失，俾百世窮經之士有所折衷，厥功偉矣。」朱熹是宋儒，他說「卓哉紫陽，百世之師。主敬立誠，窮理致知。由博返約，大醇無疵。」當然，在許多具體問題上他又對鄭、朱進行批評，但這種既有肯定又有否定的態度，正是實事求是的表現。

第二，言必有據，無證不信。崇尚實學，不務空言。這本是所有漢學家的信條，錢大昕更是如此。他反對「臆決唱聲，自誇心得」，主張「未可執單詞以爲口實」。引古人爲證，他認爲「古人有先後之殊」，「前之古人無此言而後之古人言之，我從其前者而已矣」。靠

證據說話，而且要證據充分，這類例子，在他的著述中在在皆是。例如，爲了說明古無輕唇音，他舉出了上百個例證；爲了說明說文中多經師異文，他舉出了數百個例證。這些，就是梁啓超所說的，「凡立一義，必憑證據；無證據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擯」，「選擇證據，以古爲尙」，「孤證不爲定說」。

第三，文必已出，反對剽竊。他引用韓愈的話說：「唯古於文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他在文箴中說：「文以貫道，言以匡時。非法不服，先哲是師。竊人之言，以爲己詞。欺世噉名，爲識者嗤。」他在廿二史考異序中宣稱：「聞與前人關合者，削而去之。或得于同學啓示，亦必標其姓名，郭象、何法盛之事，蓋深恥之也。」我們讀錢大昕的著作，不難看出，他不但有是言，而且也有是行。這也就是梁啓超所總結的，「凡採用舊說，必明引之，勸說認爲大不德」。

第四，平等討論，知錯即改。段玉裁潛研堂文集序說：「其氣和，故貌不矜張，辨論而無叫囂攘袂之習。」舉例來說，秦統一天下之後分天下爲多少郡的問題，這在當時學者中有爭論。有的主三十六郡說，有的主四十郡說。錢大昕是主張前說的。爲此，他和姚鼐一再辨論，又和洪亮吉等辨論。雖然反覆論難，但辭氣溫和，尊重對方，重以說理，毫無過激言詞。這和當時某些學者的一聽到不同意見即怫然不悅，變色相爭，愈辨愈烈，終至以毒言醜詆者大不相侔。他是負有盛譽的學者，但不文過飾非，而是知錯即改。例如，盧文弨指出錢大昕所校的續漢書有誤校，

他即報書承認是自己的「粗心之誤」；他在跋楊大眼造像記中不識「震憾」之「憾」爲何字，孫星衍指出「震憾」即「振旅」之異文，錢大昕即報書說：「敬聞命矣，即當刊正，以志不忘。」

第五，訂譌規過，意存忠厚。考證一類的文字，難免要說長道短，但不可逞一己之快意，拮據前人以自表襮。他在答王西莊書中說：「愚以爲學問乃千秋事，訂譌規過，非以訾毀前人，實以嘉惠後學。但議論須平允，詞氣須謙和，一事之失，無妨全體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則餘無足觀耳。鄭康成以祭公爲葉公，不害其爲大儒；司馬子長以子產爲鄭公子，不害其爲良史。所慮者，古人本不誤，而吾從而誤駁之，此則無損於古人而適以成吾之妄。王介甫、鄭漁仲輩皆坐此病，而後來宜引以爲戒者也。」這番話是有爲而發，但王西莊聽不進去。陳垣先生說：「王西莊好罵人，昔賢每遭其短薄，如謂劉向爲西漢俗儒，謂李延壽學識淺露，才短位卑；謂杜元凱剽竊；蔡九峰妄繆；……皆見其所著蛾術編及十七史商權。蓋其天性如此，又乏修養，自以爲是，而不知人之竊笑之也。」

第六，獎拔人才，折節交下。錢大昕識拔戴震一事，應該說是清代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乾隆十九年，三十三歲的戴震還只是個秀才，落落不自得。就在這一年，戴震策蹇至京師，困于逆旅，人皆以狂生目之，幾不能供饘粥。獲交於錢少詹大昕，稱爲天下奇才。秦文恭公纂五禮通考，求精於推步者，少詹舉君名，文恭延之。接着，錢大昕又在紀昀、王鳴盛、朱筠這

班同年進士中間爲戴震延譽，「于是海內皆知有戴先生矣」〔三〕。乾隆十九年，錢大昕剛中進士不久，特改翰林院庶吉士，論身份，要比戴震高得多，但他能以才論人，不唯「資歷」，實屬難能可貴。錢大昕一生獎拔人才極多，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清史稿的儒林傳、文苑傳及疇人傳中看到不少事例。

四

潛研堂文集凡五十卷，按文體分爲十四類，這是錢大昕生前手定的。嘉慶十一年，由其婿瞿中溶付梓行世，段玉裁爲之序。潛研是他嘉定住宅中的堂名。

潛研堂文集是錢大昕一生治學有得的集大成之作。它和廿二史考異、十駕齋養新錄、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等書不同，後者只能使人得其一個側面，而文集却能使人窺其全豹。拿它和其他的清人文集相比，博大精深就成了這部文集獨有的特色。清人張宗泰說：「錢辛楣先生文集，予嘗讀之一再過，其於天文之推步，地理之沿革，以及職官、姓氏、聲音、文字，無不精通。而於音韻之通轉假借，尤能推發盡致，有觸處洞然之妙，所謂通天地人曰儒者，先生非其人耶」〔四〕！潛研堂文集的五十卷文字，雖然「皆有資于經史掌故」〔五〕，但就其學術價值而言，等量齊觀是不妥當的。集中的答問、序跋、書傳，尤爲精粹。

答問凡十二卷，其內容涉及羣經、諸史、文字、音韻、訓詁、天算，其中有不少精采的論斷被後人奉爲圭臬。他在古聲紐研究方面的創始之功和卓越見解，就是這些精采論斷的一部分。這是衆所周知的。至於他在答問中的其他創見，數量很多，而且也多爲同時或後來的學者所接受。這一點，我們從阮元的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和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中也不難看出。

序跋凡十卷，李慈銘曾加以評論：「予每閱鮑培亨、潛研堂兩家題跋，深嘆其學之無所不賅，令人茫然莫測其涯涘。其讀書之精細，爲前人所未有。」他的話並非溢美。我們不妨試把錢大昕的序跋和四庫全書提要的有關內容作一比較，就知序跋確有超過提要之處。我認爲，竹汀的序跋有三長：第一，竹汀序跋的書，其中有一些是題要所無的。所謂無，一指無此書，例如跋平水新刊韻略、跋江雨軒集等就屬此類；一指無同一書的較早版本，例如跋爾雅疏單行本、跋元大一統志殘本等就屬此類。第二，對於同樣一部書，竹汀的序跋，或者可以正提要之誤，或者可以補提要之闕。例如竹汀跋秦九韶數學九章說：「此書有立天元一法，與李治測圓海鏡所衍立天元一法本不甚同，且九韶自序末題淳祐七年九月，而李氏書成于戊申歲，相去不過一年，其時南北隔絕，撰述無緣流通。李氏自言本于洞淵，非得于九韶矣。或云敬齋（李治字）用九韶法，豈其然乎！」這裏所說的「或云」實際上就是指的提要。提要是欽定的書，竹汀不便指斥，故言「或云」。因爲提要在著錄數學九章時說：「此書所載立天元一法，李治用之於勾股方

圓，其源實開自九韶。」針對這番話，竹汀就在跋中舉出三層理由予以駁正。第三，題要暗用竹汀題跋之說而不名。例如提要著錄石刻鋪敘一書說：「宋曾宏父撰。國朝初年，朱彝尊自爲之跋。然跋中謂宏父名淳，以字行，則未免舛誤。考宋有兩曾宏父，其一名淳，字宏父，爲曾布之孫。後人避寧宗諱，多以字行，遂與此宏父混而爲一，實則與作此書者各一人也。跋又謂陳思賢刻叢編，其援據廣博，顧不及此。考鋪敘諸石刻，斷手於戊申仲春，亦在淳祐八年（一二四八），若叢編則成于紹定辛卯（一二三二），相距凡十七八年，何由預見曾刻？彝尊亦偶誤記也。近厲鶚等刻南宋雜事詩，直題此書爲曾惇撰，是承彝尊之譌矣。」題要的這段話，實際上出自竹汀的跋石刻鋪敘，只不過字句略有改動。錢大昕在十駕齋養新錄的曝書亭集條更是一語道破：「今四庫全書總目即采予說也。」有的學者拘于聞見，竟指責錢大昕說：「跋石刻鋪敘辨正語，已全見提要本書下，當由未及參質，故不免蹈前人之窠臼也。」實在是本末倒置，冤哉枉也。余嘉錫先生很推重竹汀，他曾說：「竹汀當時雖與紀曉嵐齊名，有「南錢北紀」之目，實則紀不足望其項背。故提要常引潛研堂文集（當理解爲錢大昕之語），而錢氏潛研堂全集及其他著作中，於提要鮮所稱道。」

書傳凡八卷。所謂書，全是同志間的論學書劄。或答問，或質疑，或論難，言之有物，實事求是。書中的卓見很多，例如他在與一統志館同事書中說：「夫輿地之志彙及人物，特以其生長

是邦，游釣所在，俾後世聞其風者，興高山景行之思。至若魏晉以降，士大夫以門第相尚，王必太原，琅邪，李則隴西，趙郡，謝稱陳郡，裴號河東，雖去其鄉國更數十世，猶必溯其本望。此乃氏族之學，無關於地理，而後之志州郡者，昧於疆域，濫收以備鄉賢之數，甚可笑也。東坡居士嘗自稱趙郡蘇軾，而頤濱遺老又名其集曰樂城，今若以二蘇入真定之人物，可乎？不可乎？愚意若此類者，並當博考改正，庶幾一洗向來志乘之陋焉。嘗鼎一臠，可知其餘。他的這番話，對於我們今天的地志編纂，也有重要參考價值。傳中的一些名儒傳，如嚴衍傳、閻若璩傳、胡渭傳、萬斯同傳、惠棟傳、江永傳、戴震傳等，都是研究漢學的寶貴資料。清史稿中的若干人物列傳，實際上就源出于此。

段玉裁在序中斷言，潛研堂文集是一部「傳而能久，久而愈著」之作，看來不算過分。不錯，文集中的許多精采論述已爲後人所承受，但爲後人所忽略的也不是沒有。忽略就會帶來失誤。例如，史書中到處可見的「調」字究爲何義，當時的一統志總纂官已不很清楚，誤以爲「更換」之意。錢大昕根據字書，根據古注，多方舉證，如匡衡射策甲科，調補平原文學；狄仁傑舉明經，調汴州參軍；宋務光舉進士及第，調洛陽尉；等等，說明「調」是「遷」（選官）之意，「改調、降調」之名，明史始有之，唐以前未之有也（毛）。他的結論是正確的。而我們今天的一些詞書和注本却仍然以「遷轉」、「調動」一類的字眼來解釋此「調」字，實在是扞格難通。試想諸人始獲功名，